

# 南宋临安城寺庙分布研究

牟振宇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 南宋临安城存在三种主要寺院: 佛寺、道观和民间信仰。其分布特征主要是分布集中和地域差异, 集中分布区为: 南山区、北山区、吴山区、城西北区和灵隐区, 这五个区的寺庙种类和功能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分布格局与历史地理、官府城市规划、城市形态、居住区人群、寺院功能等各要素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南宋; 临安城; 祠寺分布

中图分类号: K99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146(2008)01-0095-07

## 一 问题的提出

杭州很早就 在许多的文献中被描绘成宗教圣地,《五代诗话》即已称其为“佛国”,可知当时佛教昌盛、寺庙众多;到了南宋,杭州的佛教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咸淳临安城志》称“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胜于钱塘,而学浮屠者为尤重。”<sup>[1]</sup> (卷 75 寺观一)

现存南宋当朝文献如《梦粱录》《武林旧事》和《临安城志》等,对寺庙的论述均占很大篇幅。以后各朝对此的论著也不断地出现,如元朝的《马可波罗游记》、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清徐逢吉的《清波小志》等等。关于名寺的专著,如清康熙年间孙治初辑的《武林灵隐志》等;近现代的著述更是层出不穷。但这些文献要么是资料汇编,要么专注于宗教本身的历史演变,对于寺庙空间分布的整体研究和地域差异的分析甚少,至多叙述方式上以游记的方式,叙述某一地区有某些寺庙,但缺乏概括和总结这一地区的整体特征,缺乏对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分析。

其实,对古代城市寺庙分布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关的论文,其中辛德勇《唐代长安寺院分布》最具影响,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视平台。南宋杭州寺庙空间分布研究者,以饮誉海内外的日本宋史专家斯波义信最为著名。他在《宋都杭州

的城市生态》一文中,根据文献绘制了杭州主要佛寺道观的分布图,并对此做了简单的描述。但他对于南宋杭州城哪些地区寺庙分布较为集中,不同地区又分布着哪些类型的寺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布格局等问题都没有做出回答。本文就是在他 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做尝试性回答。

## 二 南宋临安城寺庙的分布特点

南宋行在临安城寺庙众多,梵宇林立。南宋端平二年(1235)耐得翁《都城纪胜》把寺庙分为佛寺和道观两类来论述,佛寺下又分为禅刹、律寺、教院等各种,道观又分为御前香火、诸公观道馆、诸府第道堂等各种。对于佛寺,笔者也基本采用这种分类法,并根据当时的情况,加入一些特殊的佛寺如接待寺、功德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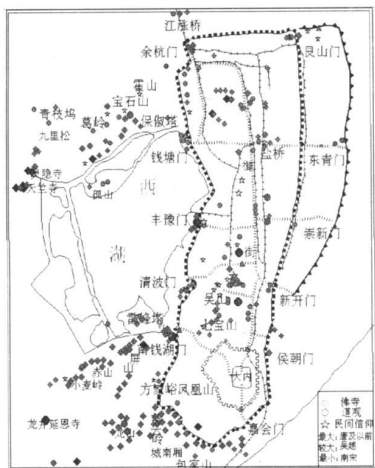
但对于道观的分类,笔者有不同的意见。《都城纪胜》把“神仙应缘现迹”的祠寺列入道观并不妥当。“神仙应缘现迹”之处主要指民间信仰的祠寺,本人以为并非道观的范围。宋末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把民间祠寺和道观分开,将民间祠寺专门置于“祠祭”一卷中,有相对科学性。当然,吴氏将道观与大内、太庙放在一起也不合适。

笔者在对有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临安城上述三种不同信仰的祠寺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

收稿日期: 2007-12-03

作者简介: 牟振宇(1979-),男,山东高密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差异。鉴于这一特点,我们首先将有籍可考的寺庙在地图上定位,制成南宋临安城寺庙分布图:



[此图以莫尔(A·C·Moule)复原图<sup>①</sup>(1274年南宋杭州)为底图,莫图系13世纪规划与现代勘测复原。寺庙分布则主要根据文献结合现代研究考证在图上复原。其中佛寺道观各用一种图标表示,民间信仰用星号和三角两种图标表示。南宋时存在的不同时代建造的寺庙用同一形状的大小表示,最大的表示唐朝时所建寺庙,其次为吴越时所建,最小的是南宋时建]

从此图可见佛寺主要集中在南山区、城西北区、北山区和灵隐区,道观主要集中在吴山区、城西北区和北山区;民间信仰主要集中在吴山区、北山区、沿海、沿江。为了深入了解南宋临安城祠寺分布的特点,我们依据文献,分别论述这三类寺庙的地域分布特点。

### (一)佛寺的分布特征

由上图我们得知, 佛教寺庙主要集中分布在南山区、葛岭区和灵隐区。这三个区域的佛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类型上都有明显的不同, 下面我们就本区论述之。

## 1. 南山区

这一寺庙分布区大致从钱湖门外沿南山区经南屏山、赤山至小麦岭一带,是南宋时期临安城城内佛寺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是,这里的佛寺多为吴越旧寺。

据《咸淳临安城志》记载，这一地带共有 60 所佛寺。其中，修建于唐代的有 6 所，修建于吴越时期的则多达 46 所，新建于南宋的仅有 8 所。在这些佛寺中，以净慈寺最为著称，它建于吴越显德年间，至北宋时已有相当规模，常有高僧大德驻锡于此，如建隆初有撰写《宗镜录》的延寿禅师，熙宁年间有宗本禅师在此弘法，极一时之盛。据《咸淳临安城志》记载，净慈寺南宋初期毁于战

火，绍兴时再获重建。绍兴九年（1139）赐额净慈报恩孝寺。后虽曾多次被毁，但旋即复建。孝宗时，净慈寺列为“禅院五山”之一，有“閻胜甲于湖山”之誉<sup>[1]</sup>（卷78寺观四）。据日本学者研究，南宋时期净慈寺声名远扬，有不少日本僧人到此求学，其中有圆尔辨圆及其弟子无关普门、天佑思顺、真应禅师南洲宏海等人，这些僧人学成回到日本后，对日本禅宗的发展影响很大。<sup>[2]</sup>

此外，这一地区的寺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南宋时新建的 3 所佛寺，都是当朝太后与皇妃的功德庙或坟寺，“南渡后七帝（并佑陵）皆櫟东粤。五后櫟杭之赤山。”<sup>〔3〕</sup>位于钱湖门外三里的修吉寺先后为孝宗成穆郭皇后和成恭夏皇后、光宗慈懿李皇后和宁宗恭淑皇后的櫟宫；<sup>②</sup>又如位于小麦岭的崇恩演福禅寺，淳祐八年（1248）充理宗贾贵妃櫟所。同样位于小麦岭的旌德显庆寺，嘉定四年（1211）初专为宁宗杨皇后修建，作为她的功德院。事实上，这些寺院本来就与皇室关系密切，所以后来才用作后宫的坟寺或功德院。如孝宗时降旨演福寺改为禅院，同时将平江府良田五千亩赐于该寺；在这方面显庆寺也不输于演福寺，宁宗时专为此寺题名，理宗时再赐其良田三千亩。<sup>〔1〕</sup>（卷 78 寺观四）由此可以看出这两所寺庙地位的不同寻常。

除此以外,从上图亦可看到,从方家峪经慈云岭至包家山一带亦是佛寺极其密集之处,并且多数为吴越寺院。由于不同文献对于这些寺庙在南宋时期是否存在分歧很大,<sup>③</sup>所以本文对此地区的寺庙数目难以做出明确统计,但这里有众多吴越旧寺院则是无疑的。

## 2 城西北区

这一寺庙分布区位于从钱塘门沿运河到盐桥一线以北的城区,寺庙主要集中在盐桥、观桥、贡院、御街两侧、新庄桥西一带。据南宋时期的文献记载,这里有佛寺 22 座。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是,这一地区的佛寺多为南宋所建,据笔者统计,

①转引自沃茂寿《中国城市的宇宙观》，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第69页。

②《宋史》卷二四三，列传第二，后妃传下：成恭夏皇后传、光宗慈懿李皇后传、宁宗恭淑韩皇后传。

③《咸淳临安志》卷 76 寺观二, 论述了这些寺庙, 但又说“后皆不存”, 具体何时不存没有论述, 因而也就不能确定这些寺庙是否为南宋时所存寺庙。当时其他文献中, 对这些寺庙有的有记载, 有的则没有记载。

肇建于唐代的寺庙有元真寺、明庆寺 2 所, 兴建于吴越的有 4 所, 修建于南宋的则多达 16 所。

此区佛寺多为官寺, 地位显赫。南宋朝廷常在此举行祭祀祈祷活动, 木子巷的明庆寺, 南宋初期, “凡朝家祈祷, 及宰执文武官僚建启圣节道场咸在焉”, 每遇盛大节日或皇帝皇后圣诞日, 朝臣也都在此举行庆典, 因之时人将其“视为东京(开封)大相国寺”, [1] (卷 76 寺观二) 由此可见此寺地位之崇高; 木子巷北的千顷广化院在南宋迁都临安城后, “为临江城府祝圣道场所”, 同时也是“群臣僚佐建启圣节道场及祈祷去处” [3] (卷 15 城内外寺院), 地位也不同凡响。

除了以上几所寺庙外, 这一地区的大部分佛寺南宋一代并没有得到发展, 最为典型的应属位于贡院西的祥符教寺。此寺原系大中祥符寺, 从“梁大同二年, 邑人鲍侃舍宅为寺”, 到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发展为一规模宏大的寺院, 据称“寺基广袤九里有奇”, 成为当时杭州城内最大的寺庙。但两宋之际毁于战火, 南宋迁都后, 这里“斥为军器所, 其西南隅建寺, 余地多为民居” [1] (卷 76 寺观二), 可见南宋时的祥符寺只相当于原寺的一小部分, 规模远不能与北宋时相比肩。

### 3 北山区

这一地区位于从钱湖门外, 经保俶塔、葛岭, 至孤山西一带。这里有佛寺 13 所。

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是, 这里的佛寺历史悠久, 如位于葛岭西的玉泉寺, 兴建于南齐建元年间; 而“以鸟巢禅师得名”的喜鹊寺, ④建于唐长庆年间。据史载, 这一地区前朝时寺庙众多, 到了南宋时期, 所剩无几。不过, 也有个别寺庙是南宋初期由临安城城内其它地方迁徙而来, 如玛瑙宝胜寺, “旧在孤山, 绍兴二十二年(1152)以其地为延祥观而徙寺于葛岭之东”。再如智果庙原在孤山, “绍兴徙筑宝石山麓”。 [1] (卷 79 寺观五) 但无论如何, 这一地区南宋时渐趋衰落, 地位和影响均不能与前朝相比。

### 4 灵隐山区

这一寺庙分布区位于从九里松经飞来峰至天竺寺之间。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是, 这里寺庙数量不多, 但是规模较大, 历史悠久, 其地位和影响力在临江城府乃至全国均首屈一指。其中, 以灵隐寺和三天竺寺最具典型。

灵隐寺由梵僧慧理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 [1] (卷 80 寺观六) 初时规模较小, 梁武帝时

初具规模, 唐时发展为天下名寺。吴越建隆元年(960) 钱鏐命延寿禅师拓建僧房 500 余间, 不久再行扩建, 建僧房宇殿 1300 余间, 据《十国春秋》记载, 其时延寿禅师“度弟子一千七百人, 着宗镜录一百卷”。北宋时, 灵隐寺已蔚为大观, 多次获朝廷赐钱、赐田, 如天圣二年(1024) 作为章懿太后的功德寺, 在皇帝诞辰日, 仁宗诏赐灵隐寺庄田 13 000 余亩以表孝心。因此, 终南宋一代一直香火旺盛, 南宋诸帝均曾到此祈拜。孝宗时, 灵隐寺列为“禅院五山”之一, 高僧辈出, 对日本禅宗影响甚大。

三天竺寺是上天竺寺、中天竺寺和下天竺寺的合称。它们分别兴建于东晋、隋、吴越时期, 其中下天竺寺修建最早。三寺得到历代官府的供养: 上天竺寺是为观音寺, 南宋时, “每水旱, 朝廷必祷焉”; 中天竺初为华严宗, 北宋时成为禅院, 政和四年(1114) 徽宗改其名为“天宁万寿永祚禅寺”, 南宋时列“五山十刹”中的禅院十刹之首。

靠近灵隐区九里松一带的寺庙有两大特点: 一是寺庙布局分散, 二是有大量的功德庙。

九里松一带最大的寺庙, 是作为理宗宠妃阎氏功德庙的集庆寺。此寺位于九里松黄泥岭, 始建于理宗淳祐十年(1250) 历经三年始成, “殿宇壮丽甲于灵隐、天竺”。《咸淳临江城志》记载, 建成后的集庆寺, 寺前据有月桂峰山麓平旷地 60 亩, 另有回通堂、西方殿(无量寿佛)、禅观阁、法轮宝藏殿、龙华海会堂、百官堂等建筑和僧斋(宿舍) 80 余所。因此, 《淳祐临江城志辑逸》盛赞此寺气势非凡: “北高巍峰耸其左, 双涧合流绕其前, 胜势华粲, 为灵(隐)、(天) 竺钟侵锁钥。”寺僧最多时达 1250 余人。据住持僧思静的《寺庄田记》载, 理宗亲赐寺田 18200 余亩和山地 7090 余瓦及钱 20 万缗。另如崇亲资福院奉张淑妃香火、荐福寺为宪圣慈烈太皇太后家坟寺, 等等。 [1] (卷 79 寺观五)

总之, 南宋临安城佛寺分布有以下二个鲜明特点: 一分布广泛, 但又相对集中在几个区域内: 南山区、城西北区、北山区和灵隐区; 二不同区域之间佛寺类型和功能存在很大差异: 南山区多吴越时所建的律寺和教院, 城西北区多南宋当朝所建的官寺, 北山区吴越时所建佛寺和南宋寺院平分秋色, 灵隐区则多前朝古寺, 西湖周围和九里

④参见《武林旧事》卷五。

松一带多功德庙。

## (二) 道 观

南宋临安城道观的地域分布与佛寺基本一致,主要也集中在吴山区、城西北区和北山区等处,下面分区叙述之。

### 1. 吴山区

这一地区的道观为当时临安城最为集中的地区,《梦梁录》亦称“天庆、灵应、至德、崇应六宫观,俱在吴山之左右”。[3](卷15 城内外宫观)其中以位于吴山麓东侧、御街左侧的道观三茅观、天庆观、白马寺等最为有名。三茅观为茅山宗道观。茅山宗从齐梁至北宋鼎盛百年,为道教主流。南宋时茅山宗虽不居主流,但仍为当时一大教派,因而三茅观仍不失为当时较有影响的道观;始建于唐代的天庆观,亦为朝廷所重,获赐颇丰。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高宗赐良田500亩并免其赋税,咸淳六年(1270)度宗再增拨官田200亩,[1](卷75 寺观一)由此可见其地位显赫;白马寺也因其神白马由于护驾高宗南渡有功而受到朝廷的重视。

### 2 城西北区

这一地区道观虽然数量不多,据笔者根据文献统计有8所,但多为官寺,地位显赫。如位于新庄桥西的宫观——景灵宫、万寿宫、太乙宫,地位崇高,时人声称临安城“在城宫观,则以太乙、万寿为首”,[3](卷15 城内外宫观)由此知之。用以供奉宋室祖先神位的景灵宫,兴建于建炎十三年(1139)。据《朝野杂记》记载:“景灵宫以奉塑像,岁行四梦飧,主上亲祀之。帝后大忌,宰臣率文武官僚行香,僧道作法事,后妃六宫亦皆继往。”⑤

### 3 北山区

这一带道观主要集中在西湖周围和孤山,其特点是规模宏大,为当时之最,地位极其显赫。

其中以孤山一带规模宏大、地位尊崇的四圣延祥观和西太乙宫为代表。四圣延祥观建于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主要供奉道教神紫微北极大帝手下的四大元帅:天蓬、天猷、翊圣和真武。据称高宗赵构为康王时,曾出使金国,金人常欲加害,幸得四帅冥冥中“保驾”,方得安然返回。加之赵构生母韦太后“靖康之难”后为金人所羁,也常梦见此四神前来护卫。韦太后生还故国后,也常常感念,故高宗定都临安城后立即建祠祭祀,[4]且极尽奢华,规模宏阔。

西太乙宫,淳祐年间析延祥观地修建,东有延祥殿,作皇帝临幸之用。[3](卷8 西太乙宫)《武林旧事》中声称孤山“旧有报恩寺、观音智果院、广化寺、玛瑙宝胜院”,但因四圣观的建造,原来的这些寺庙只得改迁它处,如上文的智果庙“绍兴徙筑宝石山麓”,[1](卷79 寺观五)玛瑙宝胜寺绍兴二十二年徙于葛岭之东,[1](卷79 寺观五)报恩院也是绍兴二十一年以其地为延祥观徙,只是不知徙往何地。

总之,道观分布呈现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一集中分布在靠近大内或官府的要害之地或者环境尤佳的西湖孤山;二有鲜明的方位性:以太乙宫为例,城内的位于西北方向与城外的西南方向遥相呼应。

## (三) 民间信仰

南宋时期,民间信仰在临安城城内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分布广泛,而且影响极大。从地域上看,主要集中在吴山区、北山区、沿海沿江等地。

### 1. 吴山区

这一地区是临安城民间祠寺最为集中的地区,而且寺庙所祭拜的神祇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 (1) 自然神庙

这类神庙按照所崇拜的神祇,又可分为土地神祠和山川神祠两种。

土地神祠以城隍庙为首。此庙北宋时本在凤凰山,初名永固。绍兴九年(1139)迁至宝月山,改作城隍庙。城隍庙在民众中的影响较大,被认为不仅可以攘除疾病灾难,甚至能够决定年岁的旱涝丰歉,因而终南宋一代香火十分旺盛。

由于临安城特殊的地位,在城内还分布有众多的外郡神庙,其中以惠应庙最为著名。惠应庙本为北宋都城开封的“皮场庙”。⑥据称此神“凡疹疾疮疡,有祷辄应”,后成为大显于世的药王。建炎年间有商立者携神像至临安城,以吴山看江亭作为其祠庙,额名惠应,咸淳德祐累封王爵。

山川神祠。这一地区也有不少是专门祭祀

⑤《梦梁录》卷八,“太庙以奉神主,一岁五享,朔祭而月荐新。其五飧命宗室诸王奉礼,朔祭以太常卿行事。”

⑥《国朝会要》,转引自《咸淳临安城志》卷七十一,“东京显仁坊皮场土地神祠”。

山川神祇的祠庙,如东岳庙专奉东岳大帝。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帝圣诞之日,城内外士庶皆来祭拜,热闹非凡。[3](卷2)

(2)人格神祇

这一地区的人格神寺以忠清寺最为著名。忠清寺是祭祀春秋后期吴国功臣伍子胥的。据《史记》载,伍子胥自刎后,尸体被吴王夫差“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也许是这个缘故,后人认为钱江海潮是伍子胥的冤魂所致。当时,吴国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开始为民间祠寺,后来由于其影响日巨,许多前朝杭州当政对此进行修建。这座南宋著名的忠清寺也历史悠久:建于唐元和十年,由杭州刺史庐元辅建庙。其神也随着庙的地位重要而爵位提升:景福二年(893)封为惠广侯,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再封为英烈王,赐庙额为“忠清”。南宋朝廷每年春秋两次举行醮祭,以祈民安。另有“专掌注禄籍”的梓潼帝君庙,南宋初建于吴山,凡求取功名者大都来此庙烧香祭拜,祈求金榜题名,后南宋朝廷封为“惠文忠武孝德仁圣王”。[3](卷15城内外宫观)

2 北山区

这一地区也是祠寺相对集中的地区,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是,这里的祠寺多为忠节祠。

以岳王庙、灵卫庙、显功庙最为有名。位于栖霞岭下的岳庙,又称岳王庙,祭祀抗金英雄岳飞。此庙的建立颇为周折,绍兴十一年(1141)岳飞遇害。直到高宗退位后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5](卷33孝宗本纪)并将岳飞及其子岳云改葬在栖霞岭下的智果观音院中,将智果观音院改为祠,孝宗为之赐额“褒忠衍福寺”。此后,岳飞不断得到朝廷的加封:绍兴三十二年谥号“武穆”,庙成后又谥号为“忠武”,嘉定四年(1211)再追封为“鄂王”。[6]无数文人墨客来此凭吊,赋诗咏词,缅怀忠烈,斥责奸邪。

同样,位于钱塘门侧的灵卫庙,亦称金祝庙,也是祭祀抗金英雄的。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金将完颜宗弼率兵侵杭州,高宗弃城出走,危机时刻钱塘县令朱晔、曹尉金胜、祝威组织当地军民迎敌,在葛岭北麓挫其先锋。后因寡不敌众,均战死,乡民葬二人于钱塘门外,并为之立祠,“祠者相踵”。后经乡民申报,先后获朝廷赐额赐号:淳祐十年(1250)赐额灵卫,景定二年(1261)赐忠佐忠佑。咸淳四年(1268)再因民

间上诉,加封同时钱塘县令朱晔为显忠侯,成为此祠的主神,而将原来的金、祝二神改为配祀,置于两庑。[1](卷72祠寺二)除了灵卫庙,位于保俶塔东的显功庙也是本区域内较为重要的一座由民间信仰发展为获官方认可的祠寺。此寺专祭据称是临安城府吏的岳仲瑑。据《宋史》记载:建炎年间,金兵南侵,岳仲瑑“输家资、募勇士三百人,推钱塘尉曹十将金(胜)、祝(威)二人为首领,迎敌”。后岳仲瑑战死,合境平安,故里人缅怀其功,称之为“保稷王”。先是,在延祥四圣观内祭祀,嘉定初才建专祠于保俶塔东。咸淳四年,杭州耆老因其忠节,申报朝廷,获赐额显功,封爵忠翊侯。[1](卷72祠祀二)

3 沿海沿江祠寺(图中三角形)

沿海祠寺主要集中在都城城墙东侧,其中以艮山门周围的顺济庙和灵济庙香火最为旺盛。据《咸淳临安城志》,此二庙“考之庙记,神本莆田林氏女,数着灵异,祠于莆之圣堆”,都是供奉灵惠夫人,也就是后世大显于民的妈祖。两宋时,因该神“水旱涝疫,舟航危急,有祷辄应”,灵异卓著,多次获朝廷颁赐。据嘉泰二年(1202)两浙路转运司主管帐司李长民所撰此庙的《记文》载,北宋时浙江已建有此庙。南宋初期,又于临安城府艮山门外建造主祠,并有别祠在侯潮门外萧公桥,成为当时颇具规模的一所民间祠寺。

总之民间祠寺分布呈现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地域分布广泛,但也相对集中在几个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二不同地区的祠寺在类型和功能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吴山周围多外郡祠寺,北山区多忠节祠寺,沿江沿海则以山川神祠为主。

三 南宋临安城寺庙地域差异的形成原因

上文分别论述了佛寺、道观、民间祠寺的地域分布特征,下面我们将分别对这些祠寺地域分布的形成原因加以分析,试图揭示祠寺分布与城市自然、人文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上文的佛寺、道观和民间信仰的分布来看,尽管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但各种寺庙的分布却存在相通性,即寺庙的集中分布区域主要有以下几个区:南山区、吴山区、城西北区、北山区、灵隐区。

御前宫观分布有其特殊的原因:从政府规划和城市布局来看,宋高宗为了将杭州从一个地方性中心变为全国至高无上的首都,采东京(北宋

开封)旧制,改造临安,前后用 20 年的时间,使之初具京都之势。其中皇朝寺院的筑造活动在整个筑造过程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我们也可以从王应麟的《玉海》卷一《行在所》的记载中了解当时的筑造情况:

绍兴四年,将还临江城,始命有司建太庙。十二年作太稷、皇后庙、都亭驿、太学。十三年,筑圆丘、景灵宫、高一坛、秘书省。十五年,作内中神御殿。十六年,广太庙,建武学。十七年,作玉律园、太乙宫、万寿观。十八年作玉牒所。二十二年作左藏库南省仓。二十五年,建执政府。二十六年筑两相第、太医局。二十七年建尚书六府、大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庙、宫、省为之备焉。

尽管“郊、庙、宫、省为之备焉”,但是从天坛、太庙、景灵宫、万寿宫的位置来看,和北宋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最为明显的是景灵宫,北宋时位于宫城前御街左右两侧,取代太庙,右边与御史台相对,显然官府把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而南宋时,却把它安排在离内城很远的城西北角;太庙恰恰相反,又重新取回了原来的位置,位于临安内城前,御街左侧,但是太庙和三省六部不是对称的排列于御街的左右两侧,而都集中于左侧,从南至北依次排列着六部、三省、太庙、五府、御史台。这种布局的安排在整个中国都城史中绝无仅有。这既不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左祖右社”规制,又不符合开封旧制。古今学者大多将其归因于杭州“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其地深远狭隘”,<sup>⑦</sup>“临安城如入屋角,房中坐视,外面殊不相应”,<sup>⑧</sup>即归因于环境制约。然而笔者以为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官府实用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所导致。宋朝施行土地私有制,杭州大部分土地也就为私人尤其是达官贵人所占用,高宗为了取得这些人的支持,尽量少触及他们的利益。因而南宋初期筑造活动都是在前朝的佛寺院或者是大臣贡献的土地上进行的,如景灵宫是绍兴二年宦官刘光世的赐第改建而成。这种实用主义规划思想的实例随处可见,南宋初创时期,高宗、孝宗将一些原来地位卑微的神捧出来以宣扬其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和神秘性,并为其建造了寺庙如白马寺、旌忠观、四圣延祥观等。作为皇家寺庙,其分布更具随意性,如将地位低微的白马寺安排在太庙附近,按照前朝规制这是

不可理解的;同样四圣延祥观,四圣不过是道教中第三等级的神仙,然而其四圣延祥观的规模和建筑级别在所有的御前宫观中是最好的,甚至喧宾夺主,超过太庙和景灵宫,位于西湖孤山上风景观光均为最佳。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些神在南宋皇帝眼中,对于宣扬其皇位的合法性具有更大的价值。他们的地理分布则多处于皇朝机构附近,或者靠近大内,或者是为供给皇帝游玩的西湖之上,这完全出自皇帝的自由安排。

佛寺的分布由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造成。佛教自唐后期开始衰微,至五代时期,又历经后周世宗法难,佛家各派更趋凋零。在北方大张旗鼓地灭佛的时候,南方政权却采取了保护佛教的政策,尤其是吴越王钱氏。在他的大力支持和推广下,寺院遍布杭州内外,杭州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高僧云集,号称佛国。五代时,盛行于杭州的教派是禅宗五派:临济、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五派中“云门、临济两宗独盛天下”。到南宋时,曹洞宗取代云门,“曹洞、临济盛行天下”。在整个杭州佛教史中,禅宗始终占绝对优势,相应地,禅寺亦地位显赫,杭州著名的灵隐寺、净慈寺均为禅寺。吴越忠懿王遣使访高丽,高丽的谛观带来了天台典籍,并因此而复兴了天台宗。天台宗也就成为仅次于禅宗的教派。除了这两个教派以外,还有律宗亦是南宋盛行的一大教派,相应地,律寺的地位和数量仅次于禅寺。除了这两类佛寺外,还有一类是教院,教院主要为推广佛教而由高僧讲解教授佛家经典的寺院。教院由于是为广大下层民众而设立的,没有禅院和律寺地位稳当,往往毁坏或被别的寺院取代者甚多。吴越时建造的这些寺院,尤其是禅寺和律寺多保留到南宋,因而南宋时在西湖南北两岸仍然有大量的吴越旧寺。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城内、西湖周围和九里松佛寺则多为南宋所建。这种分布格局与南宋的政策有关。南宋初期,高宗继承其父抑制佛教政策,靠近大内的凤凰山麓成为皇家禁苑,这里的寺院则多或毁或迁于他处。城外西湖孤山的前朝寺院亦遭到同样的命运。高宗后期,政策有所变化,帝后妃朝臣奉佛者渐多,不仅慷慨捐助佛寺,有的则

<sup>⑦</sup>卫虬敏的评论,转引自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论》载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68页。

<sup>⑧</sup>参见《朱子全书》收图书集成,卷一百一十一,35页。

舍宅为寺,而最为耀眼的是占用原来的寺院或者新建寺庙作为坟寺和功德庙,这些寺庙多选在的风景宜人的西湖周围,一方面也许这种傍山靠水的位置符合风水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城内过于拥挤,选在城外乃是迫不得已的举措。

民间信仰分布与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靖康之乱后,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杭州无疑是最为主要的移民迁入地。由于生活习性各异,其居住分布呈现鲜明的地域特征:“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5](卷437程回传)江南、湘、川富商则多聚“吴山”、“凤凰山”,“杭城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是江商海贾”,[3](卷18)闽广船商则多住城东临海等等。由于其信仰的不同,导致其祠庙的分布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吴山有起源于四川的梓潼帝君庙,城东临海有起源于闽广的顺济庙和灵济庙。除此以外,有些民间信仰的祠庙的分布则主要由其神特殊功能所决定:北山路一带多忠节之祠,是因为这里是杭州城防御的重点地区,每逢战事,这里往往首先成为战场。许多为护卫杭州的勇士在此遇难,而当时人们一般会认为遇难处往往也是他死后显示其灵异功能之处,因而人们即在此建祠纪念,如上面所论述的灵卫庙、显功庙。山川神祠庙沿海、沿江、靠近山麓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四 余 论

纵上所述,寺院的集中分布区的形成是历史地理、政府规划、城市生态等各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其中吴越旧寺的分布主要由历史因素所决定,而南宋所建的寺庙的分布则与南宋初期的大移民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不同类型寺院分布的差异既是城市内部存在不同移民社区所导致的结果,又是城市内部不同地区人群的生活风格、行为方式、道德观念与价值向度的差异的体现。因而从寺庙的分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杭州城市内部文化的地域差异。不过寺庙只是城市文化的一个方面,要全面分析和把握杭州城市文化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则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2]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6—334.  
[3] (元)白珽.湛渊静语: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宋)吴自牧.梦粱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4] (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 (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 (清)沈德潜,等.西湖志纂:卷七[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

The Study of the Temple Distribution of Linan Capital in Song Dynasty

MOU Zhen-yu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emple distribution in Hangzhou city in Song Dynasty. The main types of temples in Song Dynasty were Buddhist temple, Taoist temple and folk temple. The distribu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convergence and discrepancy. The main distribution zones were Nanshan Zone, Beishan Zone, Wushan Zone, Lingyin Zone and Northwestem City Zone. In the five zones, the types and functions of temples were very different. The reasons for this relates closely with historical geography, official city planning, inhabitancy differences, urban ecology and different functions of temple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Linan city, temple distribution

(责任编辑:朱晓江)